

浅析西夏从北宋赎经及影响

□ 暨南大学古籍所 张立娜

摘要 在西夏建国前后的四十多年里,先后至少有六次向北宋购买或北宋主动赐给佛经及经秩、签牌等的现象,为西夏佛教兴盛打下了基础,也促进了西夏文化事业的繁荣。本文试图在现有资料基础上,分析西夏六次赎经及对西夏的影响。

关键词 北宋 西夏 大藏经 印刷业 西夏文

西夏是在北宋中期建立,位于中国西北部的古国,由党项人所建。党项人原来是自然崇拜和鬼神信仰,到西夏立国之前,佛教从汉地传入。西夏建立后,西夏统治者为了更好地发展佛教,治理封建国家,更是大力提倡佛教并直接参与佛教活动,“在皇权至上的封建社会里,皇室直接参与佛事活动对推动佛教发展的作用很不同寻常,它自然带有政策性的导向作用。”^{[1]540} 上行下效,佛教在下层民众中也逐渐根深蒂固,以至于终西夏一朝,虽然多种宗教盛行,佛教始终被视为西夏的第一宗教。

西夏建国前后,与佛教文化早已具有深厚基础的中原王朝北宋相比,西夏还相距甚远。西夏统治者要把自己建成一个高度崇奉佛教的国家,就很需要急起直追。除了国内采取多种措施之外,对外学习先进的佛教文化也是不可或缺的。佛典是传播佛教文化的重要一环,西夏统治者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佛教高度发达的北宋,成为了他们主要的佛经输入对象。

一、西夏最早的佛事活动

党项统治者崇奉佛教,至迟开始于德明时期,当时西夏还未建立。北宋景德四年(1007)时党项族首领、夏州节度使、西平王德明的母亲罔氏下葬时,德明要求到宋朝北部的佛教中心五台山修供十寺,并派致祭史护送供物到五台山。“(德明)母罔氏薨……及葬,请修供五台山十寺,乃遣阁门祗候袁为致祭史,护送所供物至山。复献马五

百匹,助修章穆皇后园陵。”^{[2]3990} 可见佛教已成为党项王室重要信仰。

就当时形势来看,德明时期与其父继迁时期相比,已发生很大变化。李继迁率众抗宋,基本上处在转徙无常、无固定势力范围的时期。德明时期则倾力向河西走廊发展,西击回鹘,南攻吐蕃,拓展了党项羌族的生存空间,势力范围大大扩大。1019年,李德明选定怀远镇(今宁夏银川)为都城,改名兴州。这样一来,有了稳定的势力范围和统治中心,与宋、辽的关系也趋于缓和。这种相对稳定的局势为西夏佛教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适当的内部环境和融洽的外部条件。

二、由北宋输入《大藏经》

西夏和北宋佛教交流与历代佛教交流有很大的不同,中国历代与周边国家交流佛教,一般是民间团体或是个人自发的,另一种是以政府的名义派遣僧人。朝廷直接多次与外国政权直接就佛教进行交流的情况较为少见。西夏却采取了一种更直接也更有效的方式学习宋朝的佛教,以西夏最高统治者的名义频繁向宋皇帝赎经。德明时期及西夏一朝,史书明确记载的党项人向宋赎经及宋主动赐经共六次。

第一次赎经是在德明时期。如前所述,德明时期西夏已经有了相对稳定的内部条件和日趋融洽的外部环境,况且德明本人“幼晓佛学”,对佛教有天然的热忱,于是在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十二月“丁未,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赵德明遣使来献马七十匹,乞赐佛经一卷,从之。”^{[3]2549}。这是西夏第一次向宋求赐佛经,这说明早在建国以前

学,其重视程度使留学不但对一个人在官场的晋升有好处,而且成了晋升的关键性条件”^{[9]404}。秋瑾在给她的信中也指出:“今日世界谋事,非知洋务不可,若能出洋留学数年,谋事较易。”可见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中,出洋留学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身份资本”,能够给知识分子带来切身的利益和光明的前景。在清末,把优秀的洋学生与进士、举人同等看待,而在民国之后,有过出洋留学经历的教师在待遇上往往要高于国内培养的同等级力者。在助教和讲师职称阶段,国内学历尚能担任,但副教授、教授等高级职称,国外的留学背景则成为了分量极重的筹码。

在当时浩浩荡荡的留学大潮中,中国人留学目标地主要是日本。留日学生不仅人数众多,所学的专业也很广泛,并且还频繁开展了各种社会活动。因此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社会影响方面,留日学生都超过了赴欧美的留学生。1896年,中国学子开始留学日本,尽管最初的留日学生只有13人,但以后人数呈逐年递增的趋势。据考证,“1899年增至二百名,1902年达四五百名,1903年有一千名”^[10]。1905年,日俄战争以日本的胜利而告终,这种“以小胜大”、“以东胜西”、以黄种人胜白种人的结果,再次给了中国人以极大的震撼,而就在这一年,中国延续了1000多年的科举制度也被废除,中国士子断绝了科举晋升之路,所以接下来的“1906年是留日学生人数最多的一年,共

达一万三四千或二万名之谱”形成了一个高峰。1907年留日学生也达到了万人以上。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1937年,仍然有5934人负笈东洋。而朱光潜在1930年写的《谈出洋留学》一文披露,当时在美国和法国的留学生大约有2000人,在其他欧洲各国的留学生有1000人左右。这组数据对比,有力地说明了当时日本成为了中国留学生输出的重镇。据日本研究中国留学史的学者实藤惠秀统计,自1896年清政府向日本派遣留学生开始,到1937年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为止,在42年间中国留日学生人数总计达5万余人。

应当说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中国留日学生群体在世界留学史上规模都是空前的。尽管其中鱼龙混杂,许多人上的是速成班而接受非正式教育,在整体上影响了留日学生的水准和声誉,但是前后相续几十年的留日浪潮,毕竟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极为宝贵的人才,造就了一支庞大的新式知识分子队伍,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 [1]康有为.康有为政论集(上册)[M].中华书局.1981.
 - [2]郑观应.郑观应集(上册)[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 [3]张之洞.劝学篇[M].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 [4]徐珂.清稗类钞(第四册)[M].中华书局.1984.
 - [5]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 [6]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
- ★作者朱美祿为东南大学艺术学博士后,贵州财经学院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

的德明时期,已经有了修寺、乞经等形式的佛教传播活动。

德明死后,其子李元昊继夏国公位。李元昊也曾遣使到宋朝的五台山敬佛供僧。元昊虽“阴鸷峻诛杀,然好浮图之学,通蕃、汗文字”^[2]³⁹⁹³,并从宋朝请到过卷帙繁富的《大藏经》。宋景佑元年(1034)十二月“己巳,赵元昊献马五十匹,求佛经一藏,诏特赐之”^[3]⁶⁸⁸。这是继德明求经之后的第四年,西夏自宋得到的第二部《大藏经》,可见国内对佛经需求的迫切和统治者对佛经的重视。天授礼法延祚十年(1047),元昊建立规模宏大的佛教寺庙高台寺,“于兴庆府东一十五里役民夫建高台寺及诸浮图,俱高数十丈,贮中国所赐《大藏经》,广延回鹘僧居之,演绎经文,易为蕃字。”^[4]⁴³⁵这些举动对西夏早期的佛教传播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元昊是推行西夏佛教最为关键的人物,他对西夏佛教的贡献不可湮没。”^[5]⁴²另外,李元昊称帝后,西夏与北宋的关系正式破裂。此后数年,元昊相继对北宋发动了三川口之战、好水川之战、麟府丰之战、定川寨之战等四大战役。宋、夏议和的第二年,西夏派僧人吉外吉、法正等到宋朝,感谢宋朝赐给佛经。显然,这种看似友好的宗教往来,是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的。

公元1048年,元昊遇刺身亡。其子夏毅宗谅祚幼龄继位,由母没藏氏代行国政。没藏氏名没藏黑云(1047—1056年10月),西夏景宗李元昊皇后。元昊时期,没藏氏曾一度出家为尼。她上承元昊的衣钵,采取多项措施,大力推进西夏佛教的发展。承天寺塔就是在没藏氏的主持下建立的,该塔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的承天寺内,是一座密檐式八角形砖塔。据《夏国皇太后新建承天寺瘞佛顶骨舍利碑》载,谅祚年幼继位,皇太后没藏氏为保其子“圣寿无疆”,李家天下和西夏王朝“延永”而建承天寺塔。承天寺塔建成当年即1055年,没藏氏遣使入贡于宋,宋赐给西夏《大藏经》,“庚子,赐夏国《大藏经》”^[6]³³⁰。这是西夏自宋得到的第三部《大藏经》。西夏遂将宋朝所赐的《大藏经》置于寺内。宋嘉佑三年(1058)、七年(1062),宋又允西夏所请,先后两次颁赐《大藏经》,宋嘉佑三年“赐夏国主贖《大藏经》,诏曰:‘……所载请贖《大藏经》并经秩、签牌等令印造,候嘉佑七年正旦进奉人到阙,至时给付’。”嘉佑七年“夏国主乞贖《大藏经》,诏曰:‘……其请贖经文,已指挥印经院造印,候嘉佑十一年正旦进奉人到阙给付’。”^[6]³⁰³谅祚一朝21年中自宋朝得到三部《大藏经》,加上前朝所得两部,先后得到《大藏经》五部。频繁的索求佛经,表明了西夏统治者对佛教的热衷,也说明了佛教在西夏已经得到广泛深入的传播。

西夏第三代皇帝惠宗秉常亦是幼龄继位,母梁氏听政。熙宁五年(1072)“十二月,遣使进马,贖《大藏经》,诏赐之而还其马”^[2]⁴⁰⁰⁹。这是西夏自宋得到的第六部《大藏经》。

据现存文献记载,西夏统治者在其建国前后的四十多年里,先后至少有过六次向北宋购买或北宋主动赐给佛经及经秩、签牌等的现象。照例西夏进马五十匹或七十匹,作为印造一部分《大藏经》的纸墨工本。北宋有时不收马匹,全部作为赠送,以表示优待。由此可见,佛经乃至佛教在北宋和西夏交往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交往形式不是常见的物物交换,而是以佛教为主体的宗教传播,佛教的作用在此已经突破了它传统意义上的麻痹思想巩固统治的作用,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西夏最高统治者除了和北宋政府直接交流佛经外,还打着供佛的口号进行军事活动。据《宋史》记载,1038年,元昊遣使到五台山供佛宝,以此打探宋朝河东军事防御的虚实。元昊在紧锣密鼓地筹备立国称帝的前夕,仍与宋朝保持着佛教的往来,并且在宋夏和战

后的第二年,随即恢复两国的佛教往来。这可能是因为当时西夏的统治者十分信奉佛教,但境内又缺乏佛教圣地的缘故。

不仅仅是和宋朝,西夏与回鹘、吐蕃、辽等周边地区也保持着紧密的佛教交流。

三、赎入佛经对西夏的影响

西夏统治者对佛教的发展大力支持,不遗余力。除来大量的从宋朝赎入佛经外,还翻译、雕印佛经,延揽高僧,广建寺院,说经讲法等,都是非常重视,一贯努力提倡的。如元昊曾于首都(兴庆)建高台寺,造高数十丈的佛塔,没藏氏(谅祚母后)于首都西方建承天寺。到西夏中后期,佛教已经发展到“近自畿甸,远及荒要,山林溪谷,村落坊聚,只椽片瓦,但仿佛有存者,无不必葺”的地步。

西夏佛教的逐渐兴盛,尤其是对佛经的重视,刺激了西夏印刷业的兴盛。西夏从北宋引进佛经,然后自己刻印佛经。自西夏前期刻印佛经已经开始,到中、后期则呈现繁荣的局面。其所刻印的文字,多为西夏文和汉文,也有藏文和梵文。除文字外,还有印刷佛画。流传于世的精品甚多,书法之谄练,画技之娴熟,甚至可以与刻印事业发达的宋朝相媲美,这些都表明了西夏雕刻印刷技术的精湛。由于西夏信佛人数众多,佛经需求量也非常大,有的一部佛经一次印刷多达十万卷。西夏刻印佛经地点不止一处,各经的板式又不一,字体也各异,表现出不同的艺术风格。黑水城遗址所出多种木雕佛经板,为研究西夏的印刷业提供了重要文物资料。西夏佛教的兴盛,促进了西夏印刷业的发展,西夏印刷业的繁荣对西夏文化事业的隆盛也起着重要作用。

佛经的大量引进也加速了西夏文字的诞生。西夏建国前夕,西夏文字在李元昊的倡导下,在汉字形制的基础上由大臣野利仁荣主持创制而成。从北宋引进的佛经,多是由汉字编纂而成,要在一般不懂得汉族语言文字的党项族群众中发展佛教,只有汉文佛经是难以为继的。用党项族自己的语言文字翻译佛经,势在必行,西夏文应运而生。佛教传播的需要,可能是西夏文字创制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西夏文字产生后,又自然地促进了佛教进一步的广泛传播。西夏佛教的广泛流传,又反过来促进了西夏文字的广泛应用。西夏文字在有关佛事活动中的应用十分广泛,甚至不亚于在世俗方面的使用。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文献,无论是俄国柯兹洛夫所得,还是英人斯坦因所获,或者是我国近些年考古发现,都证明西夏遗存的佛教文献要比世俗文献多得多。抄写、刻印西夏文佛经,在应用西夏文字过程中,使西夏文字更加完善和规范化。

另外,西夏佛教的发展,也可以从西夏与宋的交往中看到一些端倪。北宋知清涧事种世衡派僧人王光信潜入夏国行反间计,以蜡丸书送交西夏大将野利旺荣,使元昊对旺荣产生怀疑,终于杀掉旺荣。又北宋知渭州王韶、总管葛怀敏也使僧人法淳持书信前往西夏活动。北宋两次派僧人去西夏,应是考虑到尊崇佛教的西夏境内,僧人有便于活动的有利条件。

西夏佛教的迅速发展及长期处于多种宗教之首,是与诸多因素分不开的。西夏多次的赎经不仅为西夏佛教的兴盛打下了基础,而且促进了包括印刷业、西夏文字等多项文化事业的发展和繁荣。另外,对我国佛教的发展有相当的影响,是我国佛教发展史上重要的一环。

参考文献

- [1]史金波.西夏社会[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 [2]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中华书局,1992.
- [4]吴广成.西夏书事[M].//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5]张继.西夏纪事本末[M].//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